

国运兴，体育兴。百年前爱国主义教育家张伯苓的“奥运三问”，振聋发聩：“奥运举办之日，就是中华腾飞之时！”百年沧桑，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系之：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是我国“十四五”初期举办的重大标志性活动。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之后，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“双奥城市”。

“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现在我们敢去想，而且想了就能去做，做了就能做成。”

“能做成”，这也是世界对中国的印象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早在2017年会见习近平总书记时

北京冬奥会一定会精彩纷呈

就有感而发：过去我相信，现在是确信，北京冬奥会一定会精彩纷呈。经历了2020年的艰苦战“疫”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，世界目光不约而同投向中国。

中国值得这份信任。从筹办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一开始，中国就向全世界作出庄严承诺：坚持绿色办奥、共享办奥、开放办奥、廉洁办

奥，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、非凡、卓越的奥运盛会。如今，各个竞赛场馆已经完工，达到了训练和比赛要求，各项筹办工作有条不紊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，都是有时间表的。“我们在很多方面的发展，都比国际上其他国家用的时间要少。我国的工业化，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，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

义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历程。如今，冬奥会所有场馆提前一年完工，进入测试阶段，我们的很多冬奥项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实现从无到有，一些项目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，靠的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，就是靠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现代化累积起来的。”

——摘自《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筹办工作集力量办大事》（人民日报，2021年1月22日第1版）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信心十足——

让世界更充分了解新时代的中国

本报记者 刘少华

线上采访杨扬时，她刚从东京奥运会现场归来，正在酒店隔离。之前，她前往东京参加了多项会议，也现场观看了中国队多场比赛。曾经的运动员杨

扬，如今拥有诸多身份——全国政协委员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、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北京冬奥组委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……

从东京归来之际，这位曾经的冬奥会金牌得主，已经开始憧憬冰雪之约，期待一届伟大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。

东京归来话奥运 在中国年轻运动员身上看到自信

近20年前，2002年，杨扬在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500米比赛中，为中国队拿下了首枚冬奥会金牌，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。

但在国内，大家总叫她“大杨扬”。原因是，她是与比自己小两岁的杨阳一起成长起来的，从1995年进入国家队时起，两人就被分别称作“大杨扬”“小杨阳”。不光名字相似，两人在场上配合也是最多的。

“从一开始比较生涩，到后来几乎天衣无缝，不需要去安排、计划，她动我就动，她的眼神我都明白，相互之间有这样的默契真的很难得。”杨扬回忆，两人后来来到国外学习时，住处只相隔5分钟的步行距离，经常互相蹭吃蹭喝。如今，两人退役多年，依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友谊。

这两个名字，也成为了成长记忆的一部分。直到如今，杨扬的微博名字依然叫“大杨扬”，她也习惯了这个称呼。

作为曾经的顶尖运动员，杨扬直言，在东京奥运会现场看比赛，特别理解运动员冲刺以后的释放、呐喊或激动。她说，其实在比赛过程中，运动员都是小心翼翼去完成整个比赛动作的。“我个人觉得，怀有敬畏之心，才能促使你把所有能量在那一刻发挥出来，最大化地释放潜力。”

“感觉一直像站在悬崖边上，从来没觉得‘冠军宝座’就是我的，只是战战兢兢地试图保持在那个位置。”杨扬表示。

在东京，杨扬尽可能多地辗转各个场馆，去看中国队的比赛。后来因为工作安排提前回国，隔离期间，她在电视上几乎一场不落看完了后半程比赛。她觉得，与以往相比，本届奥运会中国队最大的特点是，每个队员都有自己个性化的一面，展现出了强烈的、由内而外的自信。

“这种自信不是张扬，而是带有包容与尊重的，尊重规则、尊重裁判、尊重对手，在场上可能有霸气的一面，但比赛完之后态度非常谦和，让人发自内心地喜欢。”杨扬举例说，游泳运动员汪顺在拿到200米混合泳冠军后走到匈牙利传奇运动员切赫面前鞠躬致敬，以及冠军的运动员与其他国家运动员赛后互换球衣等，都展现了中国运动员良好的自信风貌。

在杨扬看来，这一代中国运动员出生在盛世，从小接触广泛的信息，国际化程度也很高，比过去的运动员有更好的心态。相应的，大众也对运动员有了更多的宽容，从“唯金牌论”到如今为每一位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喝彩。每每成为大众热点的，是运动员场上场下可爱的瞬间、自信的模样。

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之后，加入“更团结” 坚守奥林匹克精神

今年7月20日，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投票表决，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（Faster, Higher, Stronger）之后，加入“更团结”（Together）。

杨扬感慨，奥运精神依然在引领世界前进，促进人类团结与和平。

比如本届东京奥运会上，难民代表队引起了不少人关注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最新报告，截至2020年

底，世界上有824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，今年29名难民运动员就是代表了这些人。代表团成立时，杨扬还是国际奥委会委员，亲眼见证了这一幕。她觉得，奥林匹克运动为难民们送去了希望，也提醒着我们，和平是多么可贵。

“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议成立难民代表队时，我内心特别感动，因为这不不仅仅是给了他们机会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从中学到了什么。”杨扬表示。

“奥运会从发起到现在，所呈现给世界的，都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向往的美好世界应该有的样子。”在杨扬看来，奥运会曾经经历战争等诸多考验，如今又经历新冠疫情，始终屹立不倒，正是因为这样的价值观。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可以一起比赛、一起庆祝。就算是难民运动员，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流离失所，但只要走上奥运会的赛场，都可以展示出人类的体育精神。而这，也凝聚起了全世界的观众。

这些，深深吸引着杨扬。退役之后，她本可以继续留在国家队做教练，但她选择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做冠军基金，做滑冰学校，直到走向国际组织。

2010年，杨扬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运动员身份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，直到2018年；2016年，她成为国际滑联125年的历史中首位女性速滑理事；2020年1月，她正式上任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……

伴随着对奥运精神不断深入的理解，杨扬自己的世界，也从赛场上扩大到了赛场外。

杨扬坦言，近些年中国对国际体育做出的贡献，以及国际体育对亚洲的日益重视，对女性的日益重视，让自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遇。而身处国际组织中，她总觉得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，有太大的空间需要去成长。这次在东京，是她上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之后第一次公开活动，也是第一次代表该组织参加新闻发布会，她觉得还是以一种学习者的姿态去面对这个全新的机会。

从开始短道速滑训练到退役，杨扬用了23年。如今，退役15年后，她还觉得，承担国际组织中的角色，不像做运动员那样得心应手，可以冲刺世界上最高级别的领奖台。

“23年的积累会让我感觉游刃有余，能够驾驭冰面上几乎一切，因为太熟悉了。但生活当中，退役这15年，一直都在‘小跑学习’的状态，在每个领域、每个时期，都面对着不同的挑战，依然战战兢兢。”杨扬说，这些历练是一名退役运动员逃不过去的。关键在于，自己一直坚持着内心的理想，向着心中的自由前进。

从申奥到运动员委员会 向世界推荐自己的祖国

东京奥运会结束时，很多离开东京的各国运动员、媒体记者等都注意到，北京冬奥会的欢迎海报已经张贴在东京机场内。按照计划，仅仅半年后，2022年2月4日，北京冬奥会将正式开启。

很多人还记得6年前，2015年7月31日，北京正式获得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。消息一出，举国振奋。

作为中国的第一位冬奥会金牌获得者，杨扬为这次申奥成功做出了很多贡献。那时正怀有身孕的杨扬，参与场馆介绍和各类沟通工作。最后，她一身淡蓝色西装，站在台上完成了流畅、细腻的陈述。至今她还觉得，正式陈述时，像极了当年拿冬奥会首金。那天，她自豪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一个出生于北方小县城的姑娘，因冰上运动走向世界，站在台上向世界推荐自己的祖国。

2017年5月，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成立，杨



杨扬。资料图片

扬担任主席。该委员会现有委员19人，包括现役运动员和退役运动员代表，冬季项目运动员和夏季项目运动员代表以及残疾人运动员代表。

“我们在申办的时候就提出来，要办一届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奥运会，这个也跟国际奥委会提出的理念高度契合。”杨扬说，在做国际奥委会委员那些年，每届奥运会都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带着申办城市的主办方去参观奥运会、讲解奥运会。“为什么是由运动员来带队？因为只要运动员的问题解决了，奥运会就99%成功了。北京在申办时提出这个理念，特别让人兴奋。”

运动员委员会的职责是从运动员的角度对筹办工作提出各种建议，“细到一针一线”。比如，仅2020年该委员会就向组委会提了四十多条工作建议，从帮助花滑运动员准备可能需要的补衣服的针线包，到在赛场准备足够的轮椅等保障运动员伤病的器材，再到协助确定奥运村的运动员菜单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“我们也提出了保留奥运会后奥运遗产的建议，比如在比赛场馆留下运动员的名字，留下夺牌运动员的手印、脚印等，让运动员退役后再来会有回家的感觉，也让来参与运动的普通人能看到具象的奥运记忆。”杨扬表示。

不单是会从国内运动员中间收集需求和意见，运动员委员会也会关注海外运动员群体，“比如张虹现在是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，我们会请她去了解国外运动员的相关需求。”

对北京冬奥会有信心 我们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认可

“我对中国办大赛的能力非常有信心，也对北京冬奥组委的工作非常有信心。”杨扬告诉记者。

从申奥成功到如今，杨扬一路参与、见证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稳步进行。虽然遭遇疫情，但围绕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、社会动员等工作从未中断，始终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。“我们的组织能力是可以应对这些变化的，对疫情下如何办好奥运会是

有计划的。”

间隔仅半年的北京冬奥会与东京奥运会一样，面临着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办赛的挑战。杨扬坦言，看到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，信心更足了。

当然，从专业层面来说，疫情等诸多因素，也确实导致了很多新的挑战。比如，有很多测试赛不得不取消，只好用国内的比赛来做一些测试活动。再如，尽管我们有过成功举办奥运会的经验，但的确是第一次举办冬奥会。又如，在赛事组织、专业人才等方面需要大量的国际人才，但在疫情之下人才交流会受不小的影响，需要克服困难，等等。

杨扬说，她会定期参加国际奥委会组织的世界运动员的大会，了解相关的情况。比如，在疫情情况下怎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保证运动员的训练和心理状态。

“我们准备了很多个方案，组委会尽全力来实现我们当年申办时的承诺。”杨扬表示，“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认可。”

今年两会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扬，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视频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，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，是我国“十四五”初期举办的重大标志性活动，是展现国家形象、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。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，我们如期、安全地举办冬奥会、冬残奥会，必将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，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自信心、自豪感，给全球奥林匹克“带来一束光”。

就做好相关工作，杨扬提出三点建议：一是做好国际方面工作，支持北京冬奥会如期、顺利举办；二是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，科学、安全地做好防疫工作；三是展示中国成就、讲好中国故事。

“2008年，通过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，让世界认识了一个富起来的中国，14年后，奥运会再次来到中国。有关部门应提早谋划、全面准备、系统安排，通过冬奥会契机，用国际语言和方式，将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示给世界，让世界更充分地了解新时代的中国。”杨扬建议。

展望即将到来的冬奥会，杨扬直言，客观来说，中国队在冬奥会的表现与夏奥会相比有不小的差距。从杨扬收获首枚金牌以来，迄今为止，中国队在历届冬奥会中共共获得了13枚金牌，这说明我们在冬季项目上确实基础薄弱。但杨扬也自信地表示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，本届冬奥会中国队表现一定会大幅提升。

“本届冬奥会将是自1954年以来中国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，通过跨界选材、全国动员等，一些运动员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国际水平，让人振奋。”杨扬说。

事实上，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后，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公布《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实施纲要》，明确提出，2022年北京冬奥会109个小项，要努力实现“全面建队、全面参赛、全面突破、全面带动”的目标。如今，中国冬奥备战已经初见成果，无论是在队伍建设、科技助力，还是国际合作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进步。

从申办冬奥会开始，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，北京举办冬奥会将带动中国3亿多人参与冰雪运动。杨扬由衷觉得，这大大促进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。

“参与冰雪运动的人群多了，竞技体育选材的机会也就多了，未来出好成绩的概率也就大了。”杨扬认为，这些年冰雪运动热了起来。通过申办冬奥会，我们也在各个地方加大冰雪设施的建设，有了这些设施建设，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冰雪人才出现。

展望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，杨扬觉得，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全新里程碑。“我能有机会在自己的祖国欢迎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参加冬奥会，感觉‘三生有幸’。”

8月19日上午，放下车钥匙，换好家居服，家住日本熊本县菊池郡的庄山紘宇便迫不及待地翻看起刚取回的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。今年是83岁的他与海外版相伴的第27个年头，每日的阅读与摘抄早已是老人的“必打卡项”。

“对于我这个日本遗孤来说，海外版是真正的良师益友。”庄山紘宇告诉记者，阅读海外版的报道不仅排解了他归日后的孤独苦闷，还令他及时了解到第二故乡——中国的发展变化。

日本遗孤，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特殊群体。

战争期间，日本曾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迁移“开拓团”，企图在实施武力侵略的同时通过经济侵略扎根中国领土。1941年，年仅3岁的庄山紘宇跟随父母来到黑龙江省东宁市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仓皇撤退的日本侵略者已无暇顾及在华家眷，由此便留下了大量的妇女、孩童。由于丈夫不知所踪，

日本遗孤庄山紘宇：

中国恩情永生难忘

本报记者 刘乐艺

母亲被迫带着庄山紘宇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。但因入冬后缺衣少药，母亲和弟弟不幸于同一天病逝，7岁的庄山紘宇成了孤儿。

1945年11月的一天，家住牡丹江市的郭清山夫妇收养了饥寒交迫中的庄山紘宇。东北这片黑土地，以母亲般宽厚仁慈的温暖胸怀赋予他第二次生命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幼时记忆已渐渐模糊，但庄山紘宇始终难忘第一次回家时的场景：“天空飘着雪，路格外难走，我坐在板车上，养父在前面费力地拉，养母在后面推，十多里的回家路感觉是那么漫长。”

傍晚，好不容易到家后，来不及休息，养母第一时间脱掉了庄山紘宇脏乱的旧衣

服，耐心地为他洗澡、剪发。“那天，我还第一次喝到了热气腾腾的大米粥，当时，大米可被看做是营养最丰富的主食啊。”庄山紘宇知道，自己得救了。

庄山紘宇告诉记者，养父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对于他的教育却一直非常上心。1946年，他被养父母送至当地的小学，后入学宁安一中。1958年，20岁的庄山紘宇从农业中专毕业后，留校走上讲台，开启了教书生涯。

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，日本遗孤回国也被提上议程。听闻一些遗孤陆续返日，养父母的不安情绪，庄山紘宇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

“养父母对我有救命养育之恩，我怎能抛下他们！”庄山紘宇向二老保证，不会回日本，并且还要照顾他们颐养天年。为了更好地照顾年迈的养父母，他主动要求调往离二老更近的城镇工作。直到1980年，相继为养父母送终后，他才返回原学校任教。

1987年，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帮助下，庄山紘宇回到日本。然而，之后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，由于不懂日语，他只能从宿舍管理员做起，身在故乡为“异客”的境遇令庄山紘宇精神极为空虚。

经朋友推荐，1994年，庄山紘宇第一次接触到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。“我每天都看这份报纸，并且还按自己的兴趣分类剪报。”长

期的阅读，令他一扫心中孤寂，他开始潜心学习中华传统文化。

2000年4月，退休的庄山紘宇回到出生地熊本县和水乡。回乡的第二年，一直渴望发挥对汉语有“一技之长”的他，终于实现心愿——开办中文讲座，教授汉语，弘扬中华文化。每月举办两次，每次2个小时，尽管备课辛苦，但庄山紘宇一直乐此不疲。

“因为能教授中文，我的晚年生活才变得丰富多彩。”庄山紘宇说，“伟大的中国人民拯救了我，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！我愿在有生之年做中日友好的桥梁，为促进两国友好往来而付出不懈的努力！”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严冰